

科学社会主义
活页参考资料
(16)

校内用书

中国人民大学
科学社会主义系资料室

本辑所选印的材料，是Б·А·阿金著《二十世纪初德国工人运动的高涨（1903—1906年）》一书的第三章的译文，是我系马小侠同志根据1954年莫斯科俄文版译出，由郑异凡同志校订。它为德国工人运动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研究，提供了较丰富的材料。

至此，“高涨”一书全五章的译文，本“资料”已分辑全部刊印完毕：引言和第一章（第12辑），第二章（第15辑），第三章（第16辑），第四章（第4辑），第五章和结束语（第10辑）。

目 录

鲁尔煤矿工人总罢工

一、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矿辛迪加工人的状况	1
二、宣布鲁尔总罢工	13
三、德国对1905年1月9（22）日“流血 星期日”的反应	23
四、德国政府对煤矿辛迪加巨头的支持	40
五、机会主义的工会“中立”理论和实践	45
六、社会民主党左派在罢工期间的立场	51
七、鲁尔罢工的失败	53

第三章 鲁尔煤矿工人总罢工

(1904年底至1905年初)

1905年初，俄国开始革命和鲁尔煤矿工人举行规模空前的总罢工，这两件大事对德国工人运动，也对德国整个政治生活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表现出鲁尔无产阶级顽强斗志的鲁尔煤矿工人罢工（1904年12月至1905年2月）开始了德国工人运动高涨的特殊时期。鲁尔矿工的这场斗争是在阶级矛盾尖锐化的情况下爆发的，就其直接目的而言纯属经济斗争，但它表明，在德国工人群众中积蓄了多么巨大的革命力量。俄国革命的开始和显示出工人自发斗争力量的鲁尔矿工罢工惊醒和激励了全德国的工人，也使德国反动派胆战心惊。

一、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矿 辛迪加工人的状况

德国最大的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矿辛迪加建立于1893年，到1905年它不仅成为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地区（在这里辛迪加几乎掌握了全部采煤量）^①，而且成为整个德国的强大的煤矿

^① 1905年在鲁尔矿区，辛迪加占全区煤产量的97.7%。（见《德国煤矿工业辛迪加》。工商业部、工业局。圣彼得堡1911年俄文版，第15页）

垄断组织。1904年辛迪加采煤83,800万吨, 约占国家全年煤产量的70%。①

莱茵省煤矿工业的生产和资本继续迅速集中, 工业资本同银行资本逐渐溶为一体, 形成了所谓煤矿冶金“混合”企业。煤矿辛迪加成了国内政治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之一, “强大的”普鲁士政府也不能不给予极大的重视。

辛迪加矿劳动条件恶劣。矿工们每天在摄氏25—35度的高温下, 有时站在没膝的水中, 工作九个半至十一, 甚至十二个小时。矿工繁重的劳动没有实行任何机械化, 全凭手工采煤。

由于矿井越来越深, 工人上下井的时间拖长了, 因此工作日也延长了。

几乎没有任何劳动保护。井下常发生爆炸、塌方和瓦斯中毒, 造成大量工人死亡。上下井时伤亡事故尤多。②1900年至1904年仅仅五年里, 伤亡事故的总数增加三分之一以上——从每年6,894起增到9,950起。③而从1885—1886年至1906年这一时期伤亡事故增加了一倍。甚至像明茨这类竭力粉饰鲁尔矿工状况的鲁尔煤矿资本家的辩护士也不得不承认, 德国没有任何工业部门像鲁尔煤矿工业这样发生大量的伤亡事故。④

煤矿工人繁重劳动换得的工资少得可怜, 并且还不断下

① 库钦斯基:《德国帝国主义史》,莫斯科1952年俄文版第1卷,第135页。

② 1904年发生的工伤事故如下:爆炸111起,塌方1,569起,上下井事故1,672起,等等(明茨《鲁尔地区矿工状况》埃森1909年德文版,第101页。

③ 《1885—1929年。采矿与矿工四十年》,博胡姆1929年德文版,第81页。

④ 明茨,前引书第100—101页。

降。① 1900年，矿工的年平均工资为1,332 马克，1905 年为1,186马克。1904年鲁尔井下工人的年工资在1,006马克到1,415 马克之间；井上工人的年工资（这类工人约占总数的25%）不超过1,116马克。② 在食品、衣服、房租等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这些工资是极其微薄的，远远支付不了矿工家庭最俭朴的生活开销。③ 妇女和儿童不得不去做工。

此外，漫无节制的大量罚款往往超出工人日工资的50%，使他们深受其害。④ 按车验煤是工人尤其痛恨的一种罚款形式，验煤时，如果车斗不满或煤里混有一块石头，整车斗煤就不算数。工人全月采煤量中平均有10—28%被认为是废品，有时大大超过这个数字。例如，1903年3月在“阿罕巴赫”矿井，工人的835车煤被报废掉358车，在“内穆里”矿井被报废的煤车之多竟然使工人劳动不但分文未得，反而每人倒欠雇主两马克。雇主们任意征收罚金，无情地掠夺工人，预先定出报废的最低“定额”。例如，“米尼斯特·施太伊”矿井的检验员供认，雇主给他规定的任务是每天至少报废62车煤。⑤

① 据库钦斯基统计，德国矿工工资指数如以1900年为100，1901年为98马克，1904年为96。（库钦斯基：《德国工人状况史》，柏林1948年德文版第1卷第176页。）

② 明茨，前引书第26、84页；《德国煤矿工业辛迪加》，第82页。

③ 仅房租一项就约花去工人工资的20%——年231.5马克。

鲁尔地区井下工人的年工资1900—1905年间从1,592 马克下降为1,370马克，即下降14%；1891/1900——1901/1907年间物价上涨数：牛肉8.7%，猪肉13.9%，牛犊肉18.8%，油5.7%，土豆9.2%，等等。（见明茨，前引书第88、92、96页。）

④ 见《国会议事记录》1905年1月20日第5卷，第3914页。

⑤ 见《国会议事记录》1905年1月20日第5卷，第3914页。

由于缺少卫生监督，矿上卫生条件恶劣和住房拥挤常常发生危险的流行病。1903年矿工中发生了严重的肠寄生虫传染病。雇主和当局对流行病没有采取任何防治措施。仅在1904年一年期间，鲁尔矿工中患各种疾病的人数几乎增加了16%（从1903年的112,901人增到1904年134,112人）。1904年矿工中有48.7%人得病。①

繁重的劳动、半饥半饱的生活、流行病等等，所有这一切使煤矿工人过早丧失劳动能力，矿工的平均年龄日益下降。据官方统计，矿工劳动力的平均最高年龄1892年为50岁，1903年为46.6岁。1904年仅博胡姆的矿工中就有21,936名残废工人。②

没有一个全帝国的调节矿工劳动的法规。

残酷剥削矿工和不断抬高煤价使煤矿巨头获得巨额利润。1905年他们把股息增加到12—20%。③ 仅仅工人的罚金一项就给雇主带来大量的收入。例如，1903年“德意志凯撒”矿井企业主从被当作废品的车斗获利45,593马克，博胡姆北部地区六个矿井的企业主用这种办法获利87,000马克，等等。④

煤矿巨头一方面残酷剥削矿工，同时又千方百计使他们难

① 明茨，前引书第117页。

② 见《国会议事记录》1904年12月2、12日，第5卷，第3320、3520页。

③ 《国会议事记录》1905年1月20日，第5卷第39—46页。

鲁尔地区某些煤矿公司得到的利润更多。如：阿恩斯贝格煤矿公司1903年股息达40%，科隆矿业同盟达27%。“团结”矿业股份公司达28%，马格德堡矿业股份公司达35%，等等。（见《前进报》1905年1月8日）

④ 《国会议事记录》1905年1月20日，第5卷，第3915页。

以进行任何反抗。他们利用大量利润收买上层工人，工人贵族，让他们享受特权，使千百个工业警察、稽查员、高度熟练工人、工长等等的地位高于矿工群众。垄断资本家拒绝承认工人组织，特别是“自由”工会，顽固坚持“本宅主人”的“原则”。左派报纸《莱比锡人民报》在谈到煤矿辛迪加的要人们时写道，他们“不仅效法美国百万富翁的卡特尔化和托拉斯化，同时也效法他们的世界观和他们对道德、人道和权力的一切原则的冷漠态度”。①

莱茵省煤矿巨头千方百计奴役工人，用工人对该企业的经济依赖这条结实的绳索拴住工人，迫使工人完全依赖于他们。为了这一目的，他们叫工人居住在属于雇主的宿舍里，竭力支持他们信仰宗教，维护他们的政治落后性等等。②

1900—1903年的经济危机使煤矿工业进一步集中化，而这意味着煤矿辛迪加对矿工生活水平的新的进攻。矿山工业联盟组织里的煤矿巨头收买并关闭了大量矿区，只在最有利可图的矿井集中生产，使劳动集约化，工作日延长，成千上万的矿工失业。

矿场倒闭是矿工的真正灾难，成千上万的矿工被迫到新的地方去寻找工作。③大量关闭矿场不仅仅使千百万矿工蒙受苦

① 《莱比锡人民报》1905年2月7日。

② 1900年鲁尔21.2%的矿工住在企业主的宿舍里。这一年全部工人225,907人中124,245名矿工有自己的住房，即略多于50%。（明茨，前引书第131页）

1905年，住在企业主宿舍里的矿工人数又有增加。

③ 1904年4月俄国财政部代表格林瓦尔德在彼得堡宣布：“在这种情况下事情因下述事实而复杂化了：如今留在矿井的工人大部分不是

难，激起他们的愤慨，而且也使广大医生、教师、小商人等等失去生活来源。

同鲁尔区组织得很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工业巨头对抗的是分散的工人群众。垄断资本家利用鲁尔工人的落后，宗教、民族和政治成分的复杂，千方百计瓦解他们的力量，人为地培植基督教工会、自由工会（希尔施-敦克尔工会）和民族（波兰）工会。煤矿工业中半数以上的工人是天主教徒。废除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以后，天主教中央党在梵蒂冈和整个德国反动派的支持下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就着手建立了专门的基督教矿工工会（随后又建立了其他行业的这种工会），其主要宗旨是用一切方法维持“社会和平”，阻止社会民主党革命分子的影响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④这实际上是在很大程度上靠企业主

流浪无产者，而是拥有带小园子等等的少量不动产的人。这种财产在现时条件下将完全失去价值；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财产所典押的机构和个人也将蒙受损失。损失也扩大到那些无人可征税的地方公司”（《俄国外交政策档案》柏林，代办处，1904年，卷宗135，第4页。）

④ 这时在天主教中央党内两派就筹建中的工人组织的性质问题展开了斗争：一派以柏林小组为首，中央党的主要机关报《德意志报》和天主教的高级神职人员站在此派一边，此派主张在天主教会下建立一个纯粹宗教性的天主教专门支部（Fachabteilungen），主张停止罢工。另一派以慕尼黑-格拉德巴赫为中心，得到天主教《科隆人民报》的支持，此派考虑到毫无希望建立这种公开反动的、纯粹的天主教会，就主张建立各种教会混合的工会，不仅天主教工人可以参加，而且工人福音会会员也可以参加；此派允许罢工，但只是万不得已的手段，实际上不过是一纸空文，它还以基督教工会的中立原则故作姿态。经过长期的相当顽强斗争之后，较为“灵活”有蛊惑性的格拉德巴赫派占了上风，基督教矿工工会就是在他们所坚持的原则上建立起来的。

的钱而存在的工贼组织。企业主收买了这些组织的领导人。^①到1905年，基督教矿工工会约有四万会员。

由于鲁尔工业的飞速发展，从德国其他省份（首先从波兰西部地区）和外国流入大量工人。那些地方的劳动条件比鲁尔地区更为恶劣。在鲁尔始终拥有庞大的劳动后备军，这支后备军不断对矿工的工资施加压力。到1905年总罢工时，在鲁尔这支后备军达两三万人。^②占比例最大的是从波兰西部地区（西里西亚、波兹南）招来的波兰人。他们成千上万地移居到这里，摆脱其受德国地主、教士、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奴役的祖国的难以忍受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鲁尔还根本没有波兰人。1905年鲁尔全部矿工27万人中从波兰西部地区来的人占9万多（占矿工总数的33.8%）。他们当中绝大多数（8万多人）是波兰人。^③在莱茵省某些地区，例如，在格耳曾基尔亨、雷克林豪曾、赫尔内、埃森的西部、东部和南部等地区，波兰人占全部工人的半数以上。

除波兰矿工外，1905年在鲁尔地区煤矿工作的有18,000多外国工人（意大利人、捷克人、荷兰人、俄国人、比利时人等

① 例如，1904年夏，基督教工会首领布鲁斯特由于撕毁同“旧”（社会民主党）工会达成的在选举矿工工长时共同行动的协议，提出一个适合企业主需要的，激烈反对实行矿业生产改革、法律调节矿工劳动的工长的名单并使之当选等等，从企业主那里得到一笔30,000 马克的巨款（见《科隆工会案。在法庭上阐明的基督教工会基本原则》第157页）。由于“旧”工会领导人的揭露，布鲁斯特被迫辞去了鲁尔矿工基督教工会主席职务。

② 见《国会议事记录》1905年1月20日，第5卷第3912页。

③ 布雷特：《鲁尔矿区的波兰人问题》，莱比锡1909年德文版，第14页。

等)。①所有这些移居到鲁尔区的工人的劳动条件都极其恶劣。他们遭受极为残酷的剥削。波兰劳动人民在鲁尔、像在波兰西部地区一样，受到德国反动分子加紧使波兰人“德意志化”政策的压迫。②因此，波兰工人和外国工人是最“不安分”，最感到不满和随时准备进行斗争的那一部分矿工。③正是他们在1905年成为罢工者中最积极的战斗核心。

波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与中央党有联系的波兰天主教教士们害怕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波兰矿工中产生影响，急忙着手组织波兰民族矿工工会。该工会建于1903年，到1905年约有10,000名会员。工会首领也主张尽一切可能维护“社会和平”，并蓄意分裂工人群众。

所谓矿工自由工会（希尔施-敦克尔工会）到1905年仅仅有500名会员。它同上述两个矿工工会一样，也是工贼组织。

莱茵工厂主弗兰肯组织的所谓福音教派工会是公开的黄色工贼组织。不过工会会员人数不多。

资产阶级为了使无产阶级服从自己的影响，就这样分裂了

① 1905年在鲁尔矿工中有36个不同民族（见《莱比锡人民报》1905年1月12日）。

② 普鲁士王国官员，阿恩斯贝格的总理大臣1906年秋在给内务大臣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在鲁尔地区“波兰人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正在危险地增长”，认为波兰工人组织是使德国西部波兰人德意志化的主要障碍。他建议为了“国家安全的利益”以法律禁止在鲁尔地区工人会议上使用波兰语，要求坚决“消除”波兰工人“运动的极端性”，“坚决反抗”各波兰组织的“阴谋”（马恩列斯研究院档案）。

③ 阿恩斯贝格的总理大臣1906年在发往柏林的一份报告中承认：“如果波兰人成为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将成为社会民主党中最激进和最危险的分子。”（马恩列斯研究院档案）

莱茵区无产阶级的力量。

所谓“旧”矿工工会是最大的工会，到1905年约有60,000人。^①尽管它被公认为“社会民主党”的“战斗”工会，但是把持工会领导权的机会主义的“工人”首领像扎克赛、古埃之流竭力把这一工会变为莱茵区“秩序”和“社会和平”的堡垒，并为从工会肃清革命政策的一切痕迹作了不少努力。工会“中立”的资产阶级原则是这些工会活动家的指导原则。

矿工队伍分裂了，瓦解了。而其最大的不幸是，在他们最强大的“战斗的”“旧”工会中存在着怯懦的、资产阶级化了的、脱离群众而跑去为资产阶级效劳的改良主义首领。

这些工会官僚要阻止工人们的发动是越来越困难了。他们曾暂时做到过这一点。1903年夏，由于企业主和当局不采取措施防治肠寄生虫流行病，矿工们被激怒了，他们准备举行罢工，但工会官僚们阻止了罢工。1904年2月，在奥贝尔豪曾因延长半小时工作日而爆发的两千名矿工罢工有扩大的趋势，基督教工会和“旧”工会的首领竭尽全力来尽快结束这次“危险的”罢工。^②俄国外交官格林瓦尔德当时在给彼得堡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工人想以总罢工来回答企业主的进攻，为阻止工人的这一罢工，首领们花了“不少力气”。^③当行政当局作出让步，重新缩短工作日时，罢工停止了。还在这次违背“领袖”意志的罢工中，不同工会的工人就采取了一致行动，共同争得了缩短工作日的胜利。

① 见《科隆工会代表大会》1905年5月，第142页。

② 见《前进报》1904年2月6日。

③ 《俄国外交政策档案》柏林，代办处，1904年，卷宗135，第5页。

资产阶级十分赞赏工会首领的努力。企业主的《莱茵人民报》在1905年总罢工前不久充满信心地写道：“只要现在的领袖还在领导工人，就不会有任何罢工。”^①

矿工群众对“领袖”的这种行为是另一种反应。1905年初倍倍尔证实：“最近几个月里，在工人领袖和矿工群众之间，每个星期，每一天都发生着激烈的争论。在这些争论中……矿工们把扎克赛、古埃及其他领袖称为罢工的扼杀者(Bremser)，叛徒，不再愿意维护工人利益的人，工人们认为，这是由于他们有较优越的社会地位。”^②

现在鲁尔区的稳固的“安定”状态已不复存在。煤矿辛迪加这时特别加紧关闭矿区，使成千上万的矿工失业，越来越引起矿工的愤慨，这根本无助于维持“社会和平”。1904年12月20日《前进报》记者不安地报导：“在鲁尔区……，举行了多次矿工集会。工人们异常激动。在“维克多尔”区……许多工会会员被解雇。”^③正如《前进报》记者报导的，矿工们在会上越来越坚决地要求：“举行罢工！议论得够了！”^④

可以感觉得到，事情正向严重的经济斗争发展。

① 引自《通报》1905年5月25日第12期，第178页。

企业主的这种赞扬反而使领导人大为不满，因为这大大破坏了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古埃承认说：“这造成了群众的不信任，当我们出现在工人会议上，人们就会对我们说：看，甚至连《莱茵-威斯特伐利亚报》都把你们叫做罢工的扼杀者(Bremser)”（《国会议事记录》1905年1月20日，第5卷第3909页）。

② 《国会议事记录》1905年2月3日，第6卷，第4232页。

③ 《前进报》1904年12月20日。

④ 《前进报》1904年12月24日。

这使某些工会领导人开始感到不安，尽管他们仍希望能像他们过去所做的那样，在关键时刻阻止住群众的发动。他们当中许多人认为鲁尔会发生大罢工是完全难以置信的。没有一个全体矿工的统一组织，工人们分属于各个敌对的工会，缺少物质资料，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矿辛迪加的煤矿巨头的高度组织性和团结一致，在工会领导人看来，这一切使得这种罢工根本不可能发生。工会领导人不愿看到，矿工内心有一种愤慨和渴望斗争的情绪。

然而，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地区的风暴的迫近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使资产阶级政治家、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和工会“领袖们”感到忐忑不安。随着鲁尔风潮的加强，尤其是从1904年12月公开运动的爆发，天主教中央党、“自由思想党人”和社会民主党就明显地在议会加紧了矿业生产的立法改革活动。一个接一个地向德国国会和普鲁士议会提出关于改革的质询、建议、要求，发表没完没了的讲演，批评政府的“无所事事”和“消极态度”。^①

鲁尔大罢工使德国资产阶级极为恐慌，尤其是这时候俄国正明显地接近于爆发革命，这会在德国引起严重的政治震动。1904年年底在国会上关于矿工和矿业立法的谈论就没有停止过。

1904年12月2日，天主教中央党国会党团向国会提出了关

① 不仅工人，而且广大中小资产阶级阶层都受过卡特尔和辛迪加的压迫。甚至那些依靠大垄断组织提供原料或燃料的未辛迪加化的工业部门的大资产阶级也同垄断组织存在极大的矛盾。因此，关于垄断组织的“极端性”，关于需要国家干预并用立法限制辛迪加的权力，关于垄断工业部门实行国有化的合理性等呼声越来越多。越叫越响。

于在全德实行统一的矿业法、矿工八小时工作制，无计名投票选举工人委员会等等的提案。^①就在这次会议上工会领导人扎克赛代表社会民主党党团要求实行矿场国有化，用法律调节矿工的劳动，让工人参加矿区检查局，对互相储金会实行工人监督，关于结社的全帝国立法等等。

资产阶级政治家——“自由思想”党和天主教中央党的代表们——这些天在国会满怀恐惧地指出矿工存在着极大的不满和愤慨，坚决要求政府趁为时未晚实行必要的矿业生产改革，缓和鲁尔区的紧张空气。^②

现在矿工中出现了不少来自彻头彻尾反动分子的“朋友”和“保护人”。这种“保护人”之一，前宫廷教士和社会民主党的死敌，不无名气的施特克尔在那些日子慷慨激昂地指责政府“消极”“无为”，不愿除去煤矿工业中讨厌的绊脚石。他指出社会民主党在德国本来“善良的”威斯特伐利亚和黑森地区中的影响在危险地增长，他号召全力促进反对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基督教工人运动。^③甚至部分反映了不满煤矿辛迪加压迫的资产阶级阶层利益的民族自由党人，也支持天主教中央党和“自由思想党人”的要求。

政府对吓破了胆的议会政治家的一切号叫都无动于衷。普鲁士商业大臣米列尔发表令人安心的声明，否认在他管辖的煤矿工业中存在任何弊病，否认矿工中存在明显的不满情绪和政

① 《国会议事记录》，1904年12月2日，第5卷，第3315页。

② 见“自由思想党人”穆格丹，天主教中央党国会党团成员施特克尔等人1904年12月12日在国会的发言（《国会议事记录》1904年12月12日，第5卷第3510、3517页）。

③ 《国会议事记录》，1904年12月9日，第5卷，第3455页。

府干预的必要性。^①

然而，风暴还是到来了。

二、宣布鲁尔总罢工

1904年11月底煤矿巨头施廷内斯的“布鲁赫什特拉塞”矿井管理处宣布，从1905年2月1日起工作日延长半小时。事先建议不愿服从者离开。这使矿工们怒火中烧。他们要求施廷内斯撤消决定，并以罢工相威胁。在12月27日举行的“布鲁赫什特拉塞”矿井矿工大会上，领导者号召工人保持安静，建议向多特蒙德矿业管理局递送呈文，以和平调解冲突。整个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地区形势紧张，矿工极为愤怒，只要星星火花就足以引起自发的总罢工。“布鲁赫什特拉塞”的罢工就能成为这样的火花。有鉴于此，受托人——“旧”工会官员——代表会议于12月24日通过全力阻止罢工爆发的决定，认为罢工的时机“不合适”。^②工会领导人扎克塞那时曾在国会叙述过领导者为阻止工人总罢工付出的巨大“劳动”。^③

1905年1月5日施廷内斯宣布拒绝取消自己的决定。矿井管理处粗暴地拒绝了同矿工选举出的委员会进行任何谈判，并拒绝工人按照通常的定额出煤。第二天，“布鲁赫什特拉塞”的矿工举行了情绪激昂的大会，会上领导人勉强阻止住工人立即行动，决定等待矿业管理局的答复。1月7日消息传来，多

① 见普鲁士矿业主管部门官员迈斯纳1904年12月12日在国会代表普鲁士政府的发言。（《国会议事记录》1904年12月12日，第5卷第3512页。）

② 见《前进报》1904年12月26日。

③ 见《国会议事记录》1904年12月12日，第5卷，第3527页。

特蒙德矿业管理局拒绝承担调解的责任，而把问题转交给没有工人参加的专门委员会处理。领导人企图再一次劝工人放弃罢工和向矿业法庭申诉。但工人不听他们的。“布鲁赫什特拉塞”开始了罢工。

还在“布鲁赫什特拉塞”罢工前，其他许多矿井的工人中就有传说，辛迪加在整个矿区延长工作日。事实上许多矿井管理处确实延长了工作日，并照施廷内斯的样子，拒绝让工人出煤。这简直是对罢工的直接挑衅。^①

为回答企业主的挑衅行为，在埃森、奥贝尔豪曾、博胡姆、多特蒙德各矿井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矿工集会浪潮。运动发展得越来越广泛。工人们到处谈论着自己的极端贫困，选出罢工委员会，向雇主和政府提出要求，坚决主张罢工。矿工们要求八小时工作日，规定最低工资额（即工资不应低于这个数额），按重量收煤，取消无限制的罚款，把工人“当人看”，等等。

1月8日，“布鲁赫什特拉塞”罢工的第二天，四个工会理事会会议坚决要求其他矿井的工人未经“领袖”同意不参加罢工，把罢工限制在“布鲁赫什特拉塞”矿井上。同时理事会答应向政府提出关于迅速实行煤矿生产改革法的请求。^②在斗争刚刚开始，工人自发地联合起来的同时，各工会的“领袖们”也开始联合起来，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全力限制和尽快取消罢工。^③

1月9日“格尔库列斯”矿井（埃森）矿工举行罢工，起

① 大罢工对辛迪加大有好处。它促使煤炭涨价。煤矿巨头打算签定高价售煤的新合同。

② 见《前进报》1905年1月11日。

③ 倍倍尔证实：“……所有的矿工领袖不管其政治和宗教信仰有多大差别，从罢工一开始都表示坚决反对。”（《国会议事记录》，1905年3月29日，第8卷，第5693页）。